

6 | 文史博览

鹤壁日报

解密中印战争:

中国获胜后为何主动撤军?

解密一:

战争胜利后为何主动撤军

●档案: 53年前的今天,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战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从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这场持续了1个月左右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可是,此后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并后撤。至今,仍有一些人表示不理解,认为中国外交过于软弱,当时应当将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夺回,那样就不会留有后遗症。但是,本次解密的外交档案中,向我们表明了中国外交的宽宏大量。

1963年1月的一份解密档案中,提到中国主动停火并主动后撤。这份档案里写道: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而且还将战斗中缴获的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1962年12月14日和16日,中国政府曾两次照会通知印度政府,中方表示,中印边界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而不能通过武力解决,希望中印边境冲突不要再起……向印方移交军用物资,就是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许多友好步骤中的一个步骤。

可是,“中国方面采取的每

一个善意行动,至今都没有从印度方面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往往遭到印度政府的歪曲和污蔑,称中国的自卫反击战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中国政府对未来的寄予希望:“中印边界问题总是要和平解决的,希望印度政府改变蓄意敌视中国的态度。”

亚非国家对此战争持何态度

●档案: 一些国家从中斡旋,希望和平解决。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曾分别公开致书刘少奇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致刘少奇的信中,他表示欢迎和赞扬我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在致印方的信中称,为了中印的友好、亚非各国团结和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阴谋,希望印度接受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

为何公布交还印度的武器清单

●档案: 印度污蔑中国交还的军事设备多系废品。

中印之战后,中国政府并未

立即对外公布交还印度武器的清单,而是在战争结束了几个月后才予以正式公布。在此次解密的外交档案中,记者找到了原因。

一份档案中记载,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曾在1963年1月8日发表谈话称,印度方面从中国方面接收了一批中国边防部队缴获的印军装备,这些装备都已“损坏不堪”,中国方面交还这些装备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

档案显示,关于中国边防部队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方面一事,中国政府在战争结束之前并未予以公布,而且中国报纸也没有做过任何透露。中国政府只是两次照会印度政府通知了有关情况,这无论如何不能叫作“宣传”。“实际上,第一次公布这件事并且就此掀起一场恶意污蔑中国的宣传运动的,正是印度自己。”中国政府现在是“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列出了所有交还印度的军用物资清单,足有4页纸的内容。“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行动是一种友好的、慷慨的行动。正如清单所表明的,中国交还的物资,绝大部分是完好的,清单中所列的一部分损坏了的武器和装备,也都是印军在撤退时自行破坏了的和在战斗中损坏了的”。



1962年的中印之战(资料图)

解密四:

战争中印军遗体的处理

●档案: 遗体由中国红十字会埋葬。

一份名为“中国和印度红十字会就收集印军遗体的来往文件”的解密档案记录:1963年4月初,印度红十字会致电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到中国境内的奇普恰普河等6个地区收集在战斗中死亡的印军遗体。随后,中国红十字会复电称,印军遗体已埋葬。可对方仍要求来中国境内按

习俗处理遗体。

对于印方的再次要求,中国红十字会表示,为了照顾印度习惯,与有关当局联系后,将派出工作人员清理和焚化遗体,然后把骨灰和遗体送给印度红十字会。中国如此周到的安排,印方红十字会却不领情,声称将直接派出几个小组乘直升机飞入中国境内。

中国红十字会最终致电对方称,中国政府已要求印度政府停止印度红十字会的上述行动。后来,印方再未就此事致电中国红十字会。

(摘自《合肥晚报》)

“特务”如何变成反面角色



电影《羊城暗哨》中的国民党特务形象。

“特务”是个舶来词,由日本传入,一开始它是中性词,无褒贬之分。但在长期的国共斗争史上,特务逐渐演变成了反角,他们擅长阴谋诡计,暗杀投毒无所不能,对共产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凶残狠毒。

最初的国民党“特务”就是一群帮会流氓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便是运用帮会的著名案例。当时,上海方面由中共控制的工会力量强大,并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数千人。国共双方在城中交火,又难免玉石俱焚。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开正面抵抗,由其特务处长、青帮“悟”字辈弟子杨虎,联络沪上青帮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其效劳。4月12日当天,三人派出小弟伪装成工会会员,戴着工字袖标成群结伙地冲击工人纠察队驻地,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开枪伤人。接着军队便以调解为名,将双方全部缴械,并将事件宣布为工人械斗。事前一天,更是由杜月笙亲自下帖,以碰面商谈要事的名义,将工人纠察队领导汪寿华请到家中,乱拳打昏之后塞进麻袋活埋,造成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束手就擒。

此时,实体的“特务”工作都要由帮会代劳,名词的“特务”更谈不上褒贬。“四一二”政变后,中共紧急成立的决策机构叫作“上海特务委员会”——共产党也有特务了。

不仅中统,连军统首脑戴笠都将顾顺章借来教授技术、培训学员,并刻意加以笼络。当徐恩曾发现顾顺章有彻底脱离中统加入军统的迹象后,立即找借口将其枪杀。

军统和中统都是苏联人的学生

收了一批中共叛徒、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却始终未能取得像样的“成绩”。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等行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得到的也多是负面评价。在中统抓捕顾顺章4年之后,军统终于干了一票大案。

故事与顾顺章事件如出一辙,同样是武汉,只是主角变成了军统:中共地下党员关兆南招供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负责人的交通员。

这位上海站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登,是立陶宛籍的苏联红军上校,于1933年接替前往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负责上海站业务。在中共的支持下,华尔登将其情报网络扩充至100余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连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天津市市长张学铭(张学良胞弟)的秘书都是其下线情报员。

由于交通员的出卖,华尔登于1935年5月5日在法租界福煦路被军统特务和租界警察逮捕,并被迅速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华尔登展现出极高的情报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国籍、姓名、家庭情况及一切与案件相关情况的询问都报之以沉默,让军统人员无可奈何。沪上报界因此称之为“怪西人”案。

但是,外围交通员的叛变仍然给华尔登的情报系统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下线情报员袁殊等人先后叛变,驻上海、北平等处的情报人员纷纷逃回苏联。此时,国民政府正在进行抗战准备,与苏联的秘密外交也在积极开展。因此,逮捕苏联特工的消息没有被进一步宣扬。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尔登才被释放返回苏联。

顾顺章的叛变是国共秘密战争中,国民党第一次大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虚心求教,让顾顺章办训练班,培养国方特务。顾顺章殚精竭虑,利用他在苏联所学以及实际运用中的经验,编写了一系列讲义集成了《特务丛书》。后又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等书,成为了国方秘密战的圣经。他也为国方特务机关培养出了大批特务。

不仅中统,连军统首脑戴笠都将顾顺章借来教授技术、培训学员,并刻意加以笼络。当徐恩曾发现顾顺章有彻底脱离中统加入军统的迹象后,立即找借口将其枪杀。

曾经破获苏联红军情报组织

与中统相比,同时期的军统更像一伙笨拙的打手,虽然也吸

扩张势力。虽然特务还不能染指司法审判,却采取控诉、执行两头堵的方式最大程度确保“工作成果”。

军统则染指警察这一国家暴力工具,以夺取浙江警察学校的控制权为开端,培训干部进入各地公安局担任局长、督察长、侦缉大队队长等重要职务,为军统特务在各地的逮捕、暗杀工作提供合法身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立即以军统人员身份渗透进原属四川军阀刘湘管辖的地方警察系统。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国民党特务机关无意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军统则染指警察这一国家暴力工具,以夺取浙江警察学校的控制权为开端,培训干部进入各地公安局担任局长、督察长、侦缉大队队长等重要职务,为军统特务在各地的逮捕、暗杀工作提供合法身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立即以军统人员身份渗透进原属四川军阀刘湘管辖的地方警察系统。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国民党特务机关无意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蒋介石的赞赏。